

第九章	
「國有產權制」何罪之有？	115
第十章	
體制轉型過程中「產權」制度又如何調整？	127
第十一章	
農業集體化果真是「何必當初」嗎？	139
第十二章	
非「自由的選擇」如何突破工業化的制約	171
第十三章	
「靠天吃飯」的歷史格局又如何打破？	181
第十四章	
中國真比不上四小龍嗎？	193
第十五章	
喜讀林毅夫有關「追趕式」經濟戰略的新思維	205
第十六章	
總結：經濟分析與意識形態問題	209
附錄一 東歐國家市場導向改革的「拐點問題」	217
附錄二 紀念先師張丕介教授	243
附錄三 齊魯大地換新顏——山東之行感懷	251

## 序言：寫作緣起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三十年前開始後不久，香港便有某知名的美國「海歸」經濟學家，不時在本地的中文報紙上批判大陸的經濟政策與經濟制度。除針對鄧小平外，當然更免不了兼及毛澤東時代；說「共產主義是全世界人類有史以來最壞的制度」，並一早開始便大力鼓吹北京應即時將國有財產全面私有化，並「一夜之間」全面放開官定價格、廢除外匯管制、讓匯率完全自由化，等等，不一而足。這種見解或可聊以稱之為「革命經濟學」，但絕非近二十幾年來西方經濟學界頗為注重的、高度專業性的「轉型經濟學」研究。

某人的論調，除在香港這個被海耶克(Friederich von Hayek)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自由主義大師譽為「自由放任」經濟的典型之外，在大陸也一時風行。一則因為某人系出名門，屬朗奴高斯(Ronald Coase)的產權學派，也與美國芝加哥大學其他諸位自由主義大師過從甚密；又多次自稱就將登堂入室，拜見諾貝爾，云爾。二則因為改革開放伊始，「撥亂反正」雷厲風行，大陸許多學人也忙不及迭將毛澤東視為對立面、為新政策詳加註解；因此樂於借助「西風」，幫助政府的改革政策，製造輿論氣氛。三則是對有實踐經驗的官員或決策當局而言，任何類型的工業放權改革，就如同上世紀六十年代東歐各國的遭遇所啟示，其終極阻力都在於中央計劃體制及其形影相隨的產權國有制度；最直截了當的改革辦法，莫過於摧枯拉朽，一了百了，即刻廢除集權式的物資

配給制和官僚監控機器，以及個別企業的強制性指標；讓自由市場統管一切。因此，境外傳來的全面自由化和市場化說法仿若天際之音，備受歡迎。(可別忘了，當年還未見蘇聯葉利欽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 或「大崩戰略」[big-bang strategy]，所造成的悲慘結局，無殷鑒可循)。最後第四個原因是，其時也，西方的經濟學也開始引入大陸，對許多大學生而言，西方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所賴以植根的新古典主義以還的微觀經濟學，確實是美不勝收，講消費主權，供需自主，自由競爭，產權私有，自我致富，等等；直可媲美河圖洛書。

作者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前後凡二十五年，早年看到某人在香港報章連篇累牘談中國的經濟問題時，已經深不以為然，也頗感愕然。一早已經想動筆在報紙上湊湊熱鬧。但香港中大，如同香港大學，對教員的評審規則，一概不認可在報章上發表的拉扯類文章，就連中港台各地稍具份量的中文學術期刊的論文，也不給以考慮；結果只能盡量爭取論文和專著讓歐美各國具有「崇高國際聲譽」的期刊和出版社發表，可悲，孰不可悲。

然而，這多少年來，如何看待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毛澤東的歷史功過卻一直是作者所探討的一個主題。2008年將過去發表的十幾篇有關的期刊論文和專書的篇章結集成書，在英美兩國同時出版。標題為「中國的新工業化戰略」，副標題為「毛主席真的是多餘的嗎？」<sup>1</sup>，其意顯然，「挑釁性」亦強，期以拋磚引玉，促發國際學者共同討論此一重要的、對整個世界也是寓意深遠的當代中國經濟歷史問題。出版商也有此意，所

以未見書稿，已經同意出版。實際上殺青之前，作者也已開始着手摘其要者，連同自己其他新舊著作中的部分罕見資料，重組成不同的中文篇章，因成此書也；也算了卻了當年「湊湊熱鬧」的宿願。

本書所觸及的都是1949年建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大是大非的問題，各構成獨立篇章，夾敘夾議，作專題的討論。大體上全書的前半部探討幾個歷史性的、或曰縱貫性的問題，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天安門風暴，以及由毛時代過渡到鄧時代中國經濟政策和制度轉型中的階段性特徵。後半部則闡析幾個政策性和功能性的所謂橫切面問題，諸如工業與農業部門的產權結構、農村的資本積累方式、工農業的互動關係，以及對外經濟貿易政策如何影響經濟效率和長期經濟發展等專題。

介乎前後兩半部之間是「承先啟後」的第八章。這一方面從國際和歷史的視野，對比中國和前蘇聯以及其他東歐國家，回顧和檢討其改革歷程中所遭遇到的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異同；並特別聚焦於重大的國內和對外的政治轉折對經濟改革所造成的歷史性衝擊。另一方面則為接着的篇章所要討論的諸多頗富爭議性的橫切面議題，提供必要的分析性理念與框架，比如國有產權制度的性質與功能、農業集體的歷史作用與貢獻、官定價格(含官定利率和匯率)的經濟理性與缺陷，以及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價格等等問題。因為中國的經濟問題必然牽連到國內國外、歷史政治等各方面的問題，所以讀者實際上也先從第八章讀起，以取得一個較為全面的視野。

因為着重於專題式的論證，全書不構成鋪平直述、教科書式的，或曰學究式的系統化演繹。也因為各為獨立篇章，在說明有關的議題時必須或多或少地切入一定的背景資料；所以各章之間也難免有所重複。但在結集成書時，已經盡量加以調整、避免累贅。書的內容主要取材於作者發表於英美德意荷澳

1 Y.Y.Kueh,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Was Chairman Mao Really Necessary?* (本書中此下皆簡稱為《毛主席真的是多餘的嗎?》)(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2008, pp.x, 283.中國大陸對英文“Strategy”一字通常翻譯為「戰略」，香港則譯為「策略」。本書兼用這兩種譯法，請讀者留意。

各國的論文和專書；有關論點的數據與資料，其原註解浩繁，盡量從略。全書的表述方式，也力求深入淺出，讓沒有修讀過大學一年級經濟學的讀者，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識水準，稍具心思，便可以暢然瀏覽無礙。

書後附錄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舊作，分析東歐各國早期工業經濟改革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放權或收權」的兩難局面，尤其是「市場導向」改革的「臨界」或「拐點」難題。作為一個採用蘇式經濟體制的國家，鄧時代的改革也免不了遭遇到類似的「拐點」難題。1988年由鄧所親自啟動的價格自由化導致了物價暴漲以及「天安門風暴」便是很好的例子。因此，附錄第一篇以顯示東歐改革經驗的「前車之鑒」，可使作者在討論鄧時代的改革措施時，得以「避重就輕」。第二篇是為紀念早年也曾經留學德國的先師張丕介教授而寫的，也可藉以「管窺」德國當年工業化的經濟戰略對當代中國的可能涵義；也可讓有興趣的讀者對作者的治學背景和思維方式「有跡」可循。但收錄該篇文章，主要還是想藉以緬懷恩師。第三篇「齊魯大地換新顏——山東之行感懷」，如附錄第二篇，都是寫於2008年清明之際。「山東之行」旨在造訪臨清市館陶縣，上香拜祭丕介師；但在先師墳頭山上，也看到中國新農村的景象。千里麥田，幾乎不見阡陌，這與丕介師留學德國佛萊堡大學時所寫的博士論文中所分析的傳統中國的「農田碎分」現象，判若兩個世界。山東之行也涵蓋春秋戰國的齊魯古都，令人反思祖國文化源遠流長，浩如煙海；在討論今日的大是大非問題時，也知在歷史長河中何以定位的問題，幸甚。

作者要特別感謝這幾十年來朝夕與共，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許多同學們。作者的許多靈感、想法、看法、判斷和結論，都是與他們在課堂上「砂盤推演」出來的。也特別感謝倫敦的《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因為作為其評審編委

(1988–2009)之一，一直有幸閱讀許多有關中國經濟問題分析的最新文稿。也感謝母校，香港中大成員的新亞書院，讓本書的幾篇文章在其校內月刊《新亞生活》先行發表，使作者能就近請教於中文大學校內的朋友們。多年來未曾以中文寫作，只希望自己的水準不愧對以中國文史哲著稱的母校。

郭益耀，2010年清明節於香港

## 導論：為何不可忘記毛澤東？

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的盛大典禮，壯麗輝煌，為全世界所矚目。但同時令海內外許許多多中華兒女、以至於外人所感驚詫的是，當日天安門外長安大街上的大型遊行方陣是以「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巨幅橫額開路的，隨着才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論。這對許多人，包括國內外的許多高級知識份子而言，似乎不好解釋；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的新政被廣泛地看成是對毛時代政策的全面否定。天安門城樓上至今仍然高高地懸掛着毛的大畫像，但對許多人而言，這充其量只是把毛當成開國祖師，昇華成神，而不是解放後主政將近三十年，掌握着中國命運的「偉大領袖」。然而，本書作者還是認為應該實事求是去回顧建國六十周年的經濟建設，從不同的政策與制度層面評論毛澤東的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策略的長期效應。

作者認為不可因為大躍進失敗、「十年文革浩劫」，以及反右傾、整彭德懷等政治事件而完全否定毛澤東在經濟建設方面的貢獻。毛時代搞中央計劃、集(極)權控制、產權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公社化、自力更生，或曰「閉關自守」等類似政策，也是歷史的必然與應然。在實際的運行過程中難免有所錯失，但不可厚非，也不能說是「得不償失」。本書各篇章都圍繞此一主旋律，說明為何「不可忘記毛澤東」。

作者也認為「改革開放」所代表的是「承先啟後」的新政策格局，不可視為是對毛時代政策導向的全面否定。這一點也

充分反映在書中對「天安門風暴」的評論方面。實際上毛後的新策略之所以能夠順利展開，除了因應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之外，也受惠於毛時代刻苦經營所遺留下來的經濟與物質遺產。因此，不可將建國六十年的歷史腰斬為毛、鄧前後兩段，並將鄧時代的經濟騰飛視若「平地而起」。這不符合歷史發展的「辯證」邏輯。

經濟與政治誠然密不可分。然而，作者認為政治體制的變遷基本上是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因變數。毛時代講階級鬥爭、敵我矛盾、無產階級專政，「工農聯盟」，以及「政治掛帥」、等等，應可視為是當年所實行的那套經濟政策與經濟制度的必然政治延伸。文革所導致的政治逼害、冤獄，以及殘殺，基本上也緣起於經濟政策(兩條路線)的爭議，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政權鬥爭的白熱化。也不可因為個別年份的政治動亂，而簡單化地概括為「文革十年，全國經濟瀕臨崩潰」；這不見得符合實際的經濟歷史記錄。

同理，改革開放後政治上的逐步改革與自由化也離不開經濟增長、所得提升、人民生活改善、中產階級興起，或曰「消費革命」等經濟變遷現象；絕不可據以否定毛時代極權統治和經濟政策的成效；也不可視目前的過渡階段所面臨的種種政治難題為毛時代極權統治的餘孽，而急於求成，以致無端鼓動「全面自由化」。

國內外許多學者專家，包括國際知名的中國權威人士，習慣性地從今日對外開放的視角，在否定毛時代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及作為其執行機制的中央計劃制度之餘，竟然視毛這整套「追趕式」的工業化戰略，「違背」了被視為是任何發展中國家所應該遵循的、利用勞力密集的資源上的「比較優勢」的所謂「最高政策原則」。論者還以亞洲四小龍應用「比較優勢」原則的「成功經驗」為例，說明專注發展勞力密集型的「出口

導向」經濟，可以致富；並據此而認為毛時代錯失良機。本書作者認為這種說辭，充其量也只等同於「套套邏輯」(Tautology)也。

毛志在建立中國相對獨立自主的重輕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其政策的內涵價值準則和經濟理性，對比「比較優勢」原則而言，本來就是互為排斥的；何言「違背」？姑不論對美國出口勞力密集工業製成品，充其量也只能換取含次舊技術的機械設備硬體；殊不知時至今日，美國仍然嚴禁高新技術和敏感軍工產品對華輸出。尤為甚者，以「比較優勢」原則取代「追趕式」的工業化戰略，無異是倡議中國當年應該全面「解除武裝」，如四小龍一般地納入美國的經濟版圖；殊不知美國當年直視四小龍為自由世界反共的前沿陣地，才相應開放其廣闊富有的進口市場。

作者認為「比較優勢」原則論者大多是有名有姓的有識之士，唯獨無視冷戰時代的國際政治現實，美國視共產主義為洪水猛獸，長期圍堵中國大陸，何以奢望其當年便開放市場，恩惠毛澤東。論者雖或熟稔經濟分析，唯獨不諳簡明的地緣政治學原理，而竟然將中國與四小龍，風馬牛相提並論，並不齒當年炎黃子孫之貧窮落後；也不見偌大的神州大地，上下四方，勒緊腰帶，致力搞「兩彈一星」，以期長期擺脫美蘇兩霸之挾持；否則今日哪能與列強並排，儼然屹立於國際舞台乎。

此一時，彼一時，中國今日之能相對順利地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而不為人魚肉，基本上也是得力於過去幾十年，尤其是毛時代的克勤克儉，拼爭工業化；當然也離不開鄧時代的韜光養晦，力爭上游。實際上建國六十年中的前三十年，即毛澤東時代，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其年均增產率竟然高達6%有餘；這在世界經濟史上幾乎是沒有任何可類比的大國的歷史記錄所可以比擬的。然而，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專家卻似乎都

因為毛搞大躍進失敗和文革十年浩劫，而有意無意地忽視這一輝煌的成就(請留意，本書中所引用的GDP及其他數據，都是鄧時代及其後的國家統計局的官方數字)。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工業淨產值在GDP中所佔比重也由1952年的21%急速提升至1978年的48%；這也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記錄，使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夕已經基本上擺脫了兩三千年來「以農立國」的歷史背景。與此同時，中國的農業，在「紅旗渠」式的「努克思效應」(見本書第十一及十二章)的不斷擴充發揮之下，不但強有力地支持工業發展，也使糧食與棉花產量(就全國平均值而言)由建國初期的僅「足以餬口」和「衣可蔽體」逐步提升到毛澤東逝世時的「溫飽有餘」。這不但打破了「靠天吃飯」的歷史格局，也為鄧時代工農業進一步加速增長，以及最終納入世界經濟競爭體系，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誠然，毛時代所生產的GDP，一直以重工業(含冶金、機械、化工、基礎建設所需器材和軍需產品等)為主導，刻意壓抑民用工業消費品的生產。然而，這是強制性提高全國儲蓄率，加強投資，不斷擴大重工業基礎，以加速工業化的不二法門。這必然導致消費與生活水準長期偏低，不在話下。國內外許許多多「有識之士」只見毛時代人民長年「赤貧」，而否定毛澤東；唯獨不見毛時代這套特定的、作者稱之為「埃克斯坦模式」(見本書第四及十一章)的加速工業化戰略，其成效至毛澤東圓寂時，實際上已經累積到所需的臨界規模，以啟動鄧小平時代的「歷史轉折」的契機。

本書的個別篇章旨在闡析以上所談到的各個主要論點。此處有必要先簡單談談幾個有關方法論方面的問題。

作者對毛時代經濟政策及其長期效應的評價，在今日中國「撥亂反正」餘韻未了，「矯枉過正」猶存的情況下；其論點勢必被視為「異類」之音。在西方世界，也顯然難以見容於由

自由主義學派的思維方式所主導的西方知識界。某位香港的社會與歷史學家看了作者的文章後，竟以為作者在東西德統一之前，曾留學西德多年，應屬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er School)或受其影響。這是風馬牛的誤判。作者的論點與相關的所謂新左派(New Left)，或與其有關的、出版於紐約市的《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創刊主編為哈佛大學的Paul Sweezy)也是涇渭之分，雖然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美國反越戰運動高潮時，作者也曾在哈佛從事約兩年的博士後研究。作者當然更不是在傳統的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下立論，這也顯然見諸於全書各篇章的理念與分析方式。所以讀者不可捕風捉影，感覺作者似乎為毛澤東說了幾句好話，便誤認為有預設立場的「親毛派」或任何新、舊「左派」。

論學術淵源，作者或份屬戰後主導西德經濟復興的德國「秩序(鄂爾都)自由主義」(Ordo Liberalism)學派。該學派發源於佛萊堡(Freiburg)大學(這也是新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 Friedrich von Hayek 晚年的學術基地)，其「自由經濟」理論傾向的強烈，以及政策主張的執著，比美國芝加哥的自由主義學派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與後者有別的是，「秩序自由主義」學派有大批學者特意將當年的東德(及其他蘇式國家經濟)作為對立面進行系統化研究；作者早年也有幸參與其事。然而，舊時的德國同儕，今日看了作者對中國和毛時代的看法與論點後，也難以抗拒。畢竟毛時代的中國與當年的東德不可同日而語，相提並論。東西德統一前的東德，其工業發達程度，早已遠比今日的中國還高。中央計劃、工商業產權國有，農業集體化的集權式控制方式，當年強加於東德，本來已經是格格不入。但在中國，這整套制度作為資源的動員機制，體現「追趕式」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戰略，卻顯然在毛時代發揮了強大的歷史作用。

事實上，當年東德被前蘇聯強加以中央計劃體制的負面經

驗<sup>1</sup>也正好說明了為何在毛時代的集權式動員、或曰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戰略完成其「歷史使命」時，也即是當工業化的程度漸趨成熟，工業產品結構漸趨複雜化之際，中國也必然會轉入作者在書中所一再闡述的放權式、或曰集約式經營、講求微觀經濟效率的政策導向。這是鄧小平時代開始的「市場導向」改革的最基本的經濟理性，也是前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早已於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經濟改革的背景。這種共同的「經濟轉型」趨勢是歷史的必然，不可視之為任何主動的主觀意識形態取向或轉向的結果。

簡而言之，作者對中國經濟問題的探討，基本上是建基於西方式的比較經濟制度學視角，兼具由古典經濟學所派生的、針對落後國家的「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然而，本書設定為通俗讀物，故不能嚴格套用發展經濟學的不同理論模式，以檢驗中國或毛時代的經濟發展戰略及其效應。即使如此，各發展經濟學大師的原創性理念及分析框架，卻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本書的各個篇章之中，躍然紙上；如希爾斯曼(Albert Hirschman)的不平衡發展方式(unbalanced growth)，羅森斯坦羅當(Paul Rosenstein-Rodan)的大推進戰略(big-push strategy)，羅斯托(Walt Rostow)的經濟起飛論(take-off theory)，努克思(Ragnar Nurkse)的勞動積累說(labour accumulation)，以及路易士(Arthur Lewis)的剩餘勞力模式(surplus labour model)等等。因此本書也必然沿用西方實證經濟學的分析法，講求具體資料與統計數據的驗證，避免「從概念到概念」的想像與空轉，更不以任何超經驗的意識形態導向為依歸而操縱資料，或強加結論。作者但求實事求是，堅持「價值中立性」的分析原則，敞開客觀討論的大門。

德國的「秩序自由主義」學派，對比美國的自由主義學

1 詳見本書附錄的第一章。

派，有顯著的「政治經濟學」導向，並特別強調經濟、政治與社會制度秩序的相互依存關係(德文原詞為Interdependenz der Ordnungen)；在研究經濟過程(Prozess)時，也因此特為關注其制度秩序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的作用。作者依循此一方法論取向，雖然本書討論的主題與焦點都是毛式的經濟戰略及其相應的經濟制度措施，但書中各篇章也連貫性地涉及政治制度，以及其社會制度涵義。

「秩序自由主義」學派的奠基人，佛萊堡大學的歐庚(Walter Eucken)，其最核心的理論可分兩個層面。一則政府的責任在於建立一個有效的經濟(制度)秩序規範(德文原詞為Wirtschaftsordnung)，以保證或維持自由競爭(學派因此而得名)<sup>2</sup>，而且政府不應該參與經濟的運作過程。二則視經濟(壟斷)實權的集中，與政治上的不自由和貧困為三位一體；並以「充分競爭」的理論模式，對比「中央管理」的經濟制度，說明前蘇聯是代表最為終極的實權集中體系。歐庚的立論(1939年)<sup>3</sup>遠早於海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1944)及《自由的憲章》(Constitution of Liberty, 1960)。兩人都出身於德語系統，其知識背景和治學取向極為相似，論調也前後相呼應<sup>4</sup>。

本書作者雖或隸屬於「秩序自由主義」學派，但治學方法雷同之餘，其對中國毛時代的看法，恐怕與該學派有天壤之別。代表毛澤東的「大推進」(強制儲蓄與投資極大化)和「不平

2 戰後西德的競爭法或曰「反不公平競爭法」就是建基於「秩序自由主義」學派的理論，而可能是全世界最透徹的反壟斷立法。

3 詳見歐庚氏1939年出版的《國民經濟的基礎知識》(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oekonomie)一書，尤其是其1952年的巨著《經濟政策原則》(Grundsätze der Wirtschaftspolitik)(佛萊堡學派的最經典著作)。後者為遺稿，由其得意門生韓思爾(K.Paul Hensel)(本書作者的博士論文導師)和歐庚夫人協助校訂和完稿。

4 歐庚(1891-1950)只活了59歲，海耶克(1899-1992)則享年93歲。兩人都曾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邀請，前往講學。歐庚在戰後，不幸於講學期間客死倫敦。海耶克則在戰前，但因德國併吞奧地利及二戰爆發而長期滯留英倫；戰後轉往美國而開始聲名遠揚。

衡」(向鋼鐵和機械等大型重工業傾斜)發展戰略,以及「努克思式」(或曰「紅旗渠式」)的大動員(以創建農村的基礎建設措施,加速農業生產力的提升)(西方學者一貫視之為「奴役式」的無償勞動),都必須以極高度的經濟實權的集中和政治上的專制為制度前提,這不在話下。而且這也必然剝奪了西方人所說的「政治自由」,有違西方「民主人權」的原則;這也顯而易見。但確如本書中幾個獨立篇章所闡述的,毛的這套「鐵血」建設戰略卻令中國擺脫了「靠天吃飯」和長期貧困,或曰發展經濟學所稱的「低程度平衡陷阱」(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歷史格局。毛這一功績,肯定不比十九世紀統一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遜色。論其政策導向,也與比俾斯麥早一代的德國發展經濟學家、歷史學派創始人李斯特(Friederich List 1789–1846)力求民族自強、發展民族工業,冀早日與當時工業和國際貿易皆高度發達的英國平起平坐的精神,不謀而合<sup>5</sup>。

歐庚和海耶克都不屬於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者,但在二十世紀初期該派仍然主導德國的研究學風之下,這兩位學者,就如韋伯(Max Weber)和宋巴特(Werner Sombart)等跨學科的大師一樣,都是學問淵博;其經濟學論著都兼及政治、法律、社會等社會科學範疇<sup>6</sup>。歐庚和海耶克兩人在論及經濟壟斷與政治自由時,顯然一方面是以當時已經高度發達的德國工業經濟及寡頭壟斷的局面為背景,另一方面也面對迅速冒起的蘇聯集權經濟體系,以及希特勒的戰時經濟統制制度而立論。然而,其唯獨不見就在俾斯麥「鐵血統一」之前,那位大聲呼籲全德各邦政府與人民,團結圖強、急起直追、趕超英國的李斯特所留下的身影乎。

5 本書附錄第二章也從另一角度談及李斯特的政策理論。

6 事實上歐庚、韋伯和宋巴特三人早期也都屬於德國的歷史學派。

李斯特的所謂「政治經濟學的國家體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這是其1841年出版的成名著的標題的英文譯名)<sup>7</sup>與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 economics)和「世界主義觀點」(cosmopolitan view)的「自由經濟體系」相對立;其着眼點不只在於民富,而更也在於國強。李斯特在其書中花了大量篇幅,駁斥亞當斯密的所謂「冥冥之手」自動促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互協調與統一的想法;說明「民富」不一定「國強」的道理。他呼籲當年德國各邦政府,對外建立關稅聯盟,保護幼稚工業;對內則撤除各邦之間的關稅壁壘,令物暢其流,並大力籌建共同的經濟基礎措施,尤其是發展鐵路網路,以期構成他心中的富強的國家政治經濟體系。

李斯特發展德國鐵路網路的構想,也不禁令人想起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孫先生當年便說,他辭退臨時大總統後自己最想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下去發展中國的鐵路。事實上,德國經濟由李斯特時代至歐庚時代的轉化與轉強,成為二十世紀屹立於世界的工業強國,也可說是中國由毛時代至鄧時代承先啟後、轉型、發展、強化的軌跡與縮影。所以時至今日,仍有美國學者將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比諸於十九世紀李斯特的經濟發展戰略。

但不可忘記,李斯特並非狹隘的「保護貿易主義」者。他自己明確說明,他的「國家體系」之下的工業自強,是工具性的政策,其目的在於追趕英國,以爭取實現自由但平等的國際貿易體系。這似乎又是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異曲同工;只不過相對於二十世紀初期的德國之於英國,今日的中國之於美國,顯然還是千里之差。「世界工廠」美譽的背後,基本上是裁縫巧婦、玩偶藝術的能工巧匠,另加時尚的電子和五金機械

7 該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僅次於馬克思的《資本論》,翻譯成最多外國語言的德文經濟學著作。

學徒。為人忙做嫁衣裳之外，還被責以減碳不力、傾銷有餘。所換來的又是滿堆借據，還恐變成廢紙。情何以堪！這已經是題外話，不屬本書討論的主題。

然而，在當今由工業強國的大型跨國企業主導的全球化浪潮之下，「南北」差距，或弱肉強食，仍然顯著。「秩序自由主義」學派和海耶克反經濟集權、反霸權、反壟斷、講公平競爭，求政治自由的原理原則，似乎不應該僅限於個別國家的國內情勢，而更應該延伸至整個國際經濟社會。個別國家國內的失衡或僅觸及個別的社會經濟階層，但國際範圍內的失衡，則可能易如反掌地導致個別經濟和金融霸權國家直接或間接地將個別弱勢國家的所有人民轉化成「義務」勞工；雖不似奴役，但何以談「自由」！當前(2008/2009年)國際金融海嘯對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價值的威脅是為證也。

最後還必須簡單談及另一類西方的「自由主義」學派對中國毛時代的「中央集權經濟」和鄧的「改革開放轉型」的看法，以作為本書的討論起點。這指的是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尤以芝加哥學派(包括貨幣主義學派和產權學派)為主流。該派衍生於被馬列學派稱為「庸俗經濟學」的、始發於劍橋大學的馬歇爾(1892年)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這也是所有大學一年級學生都熟悉的當代微觀經濟學。該學派的論點一般都抽離了歐庚(甚至也被視為屬於芝加哥學派的海耶克)所關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層面與歷史的問題，而簡單化地聚焦於純分析性的經濟學問題，有意或無意地以「部分均衡」(或「全部均衡」)條件等邊際分析法，去論斷中國毛時代的中央計劃、產權國有，或農業集體化，以及鄧時代的經濟轉型過程中如何違背資源配置的效率準則，以及在國有制或集體制之下產權不清晰如何造成「激勵」(incentive)問題、資源浪費，以及額外的「交易成本」、「社會成本」等，不一而足。這類分析不時「淨化」

時空現實，學究式地將西方理論模式投影於中國的現實，其結論等於隔靴搔癢，貽笑大方。雖然如此，由於當代的標準「微觀經濟學」教科書壟斷了整個世界，包括中國大陸，這類論調誠然蠱惑人心，所以本書還得先從「新自由主義的悖論」談起，以正視聽。